

第三十九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6/0016

一九九一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何华

扉页题字：遍能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8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6.75插页1 字数154千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1188—1/K·153印数：1—3,465

定价：2.30元

目 录

- 卢作孚率民生公司船队归来纪实……………李天元 (1)
- 潘昌猷经营重庆商业银行内幕
……………石体元 刘选琛 赵世厚 (12)
- 泛滥一时的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白兆渝 (62)
-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史折 (80)
- 《甲子日报》的创办人秦正树
……………袁代奎 (执笔) 周康富 程德辉 (91)
- 回忆先烈秦正树……………文强 (104)
- 解放前的四川武林和我的习武生涯……………
……………彭元植口述 程大力整理 (109)
- 解放前生活在四川的满蒙族……………刘显之 (132)
- 中国第一枝自动步枪试制者——刘庆恩
……………刘述云供稿 王朝华整理 (163)
- 1945—1949年四川经济记事资料摘录 (上)
……………刘方健辑 李运源钟振审校 (169)

补充·订正·质疑

对《一个爱国反帝的宗教团体——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
一文的更正……………张先翥（209）
对《四川省科学馆史略》一文的更正……………梁骧（210）
对《回忆西康省训团》一文中有关王靖宇及西康保安队史实的重要更正……………（212）

EA47/29

卢作孚率民生公司船队 归来纪实

长航重庆分局史志编辑室 李天元

解放初期，美帝国主义与台湾当局勾结，敌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更假借联合国的名义，对中国大陆实行封锁、禁运，还经常派军舰在我沿海游弋堵截，洗劫北上船只，没收执照，甚至将船员押往台湾监禁。港英当局也坐视台湾特务在港策划劫船。因此，如何将在台湾的船集结香港驶回大陆，是民生公司当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了保护船舶和海员的生命安全，卢作孚亲自在香港坐镇。当时，住香港的还有胡子昂、何北衡、吴晋航、王毅灵等人。卢同他们一起观看了马连良演出的《甘露寺》，不禁想到《回荆州》。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极为复杂、混乱，而卢担心的是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民生实业公司。朋友劝他去美国暂住，卢摇头说：“只要船不损失，我什么也不怕。”他勇敢地投入了护船斗争。早在1921年至1924年，卢作孚同恽代英、萧楚女在泸州和重庆，一起从事过新教育和新文化的改革，使卢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8年卢作孚在武汉认识了周恩来。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住重庆。民生公司人事室主任何迺仁陪同卢去曾家岩50号拜访过周恩来。

1946年初秋，周恩来在地下党员萧林的陪同下，去上海路1号民生公司招待所会晤卢作孚，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最使卢作孚感动的是1950年春，何迺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香港传达党对民生公司的意见，肯定了民生公司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对加拿大造船的还本付息作了安排。抗日战争胜利后，民生公司曾几次以远远低于客货之运价，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复员运输。蒋介石发动内战期间，民生公司又将18艘大小轮船，编为专船，供国民政府差遣。“加拿大贷款”是卢作孚最操心的一件事，他为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寝。他曾经多次向国民政府申请230万元美金贷款，但被东推西拖，一无所获。相反，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外汇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政府却同意偿付船款并愿在中加建交以后继续担保，使民生公司绝处逢生。卢作孚受到了抚慰和启发。

卢作孚在香港期间，多次与中共党组织接触。1948年，通过民主人士、外贸专家古耕虞和中国银行党组赵忍安的安排，和党代表许涤新进行了晤谈。1949年5月，通过《大公报》的周太玄和古耕虞与中共党的驻港机构联系，并与党代表张铁生接触（张铁生当时在新华社工作）。卢作孚几次约张、古等在民生公司的虎门、石门等船上晤谈，因船在海上停泊，既保密又安全。据杨成质（民生香港分公司经理）回忆，他参加过多次这样的晤谈，张铁生和蔼可亲，讲话不多。卢作孚则侃侃而谈，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些见解，受到了张铁生的热情赞赏。卢作孚受到了党的政策的启迪，增强了对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加速了船队归国的进程。

在港的船多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如“民本”、“民众”、“民俗”、“渠江”、“怒江”等，设备好，马力大。尤其是在

加拿大新造的“雁门”、“虎门”、“玉门”、“剑门”、“石门”、“祈门”、“龙门”、“荆门”、“夔门”9艘门字号船，在枯水季节也可以通航，有当时国内最新的安全设备（双推进器，两层平底，擦破一层还有一层备用，铝板代替钢板，灵活轻便。在川江滩险水急中航行，安全系数特别高）。在港的18艘船，共3.8万余吨，卢作孚爱之如命。他说：“不要以为那些船只数小，吨位也不多，唯其少才更少它不得”。（“民档”永久8号）

1950年4月，卢作孚号召民生海员，全力保住船只，待机驾船回大陆，并立即召集公司高级职员拟定将陆续集结于香港、台湾等地的船只驶回上海和广州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曾向屈恩来总理汇报，并得到同意。

执行方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为了不让台湾当局发现，均以开往日本或南朝鲜为名，绕过台湾海峡，脱离危险区后再折回西驶上海。为了保密，不发电报，不打电话。每只船开出后派专人持卢作孚手谕乘火车到上海。民生上海区公司经理宗之琥接卢的亲笔信后，立即向党组织的于眉同志汇报，同时，在上海港接应（每隔六七天开一艘船）。

“怀远”号、“宁远”号由台湾回上海

1950年6月，“怀远”轮船长黎明和，“宁远”轮船长汤镇瀛，趁国民党未摸清民生公司船舶动向之时，率轮离港，并远离台湾东岸。“怀远”和“宁远”假称装货去仁川，到东海时中途折转上海，二轮分别于6月12、15日胜利抵沪。

“民众”轮由香港回上海

1950年6月中旬，当“怀远”和“宁远”回上海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重视。市上的小报也披露了民生海员投共，各海轮将陆续秘密驶向上海的消息。卢作孚棋高一着，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远航客货线为名，将“民众”轮驶出台湾。“民众”轮在香港结关是中午开往南朝鲜，但该轮船员故意拖延，出其不意改成夜航，大海无边，夜色茫茫，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大家团结一致，冒着生命危险，强行通过台湾海峡。突然，海面出现了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从多方直射船身，情况异常紧张。此时，万竞吾船长巧妙而大胆地将“民众”轮改向靠近台湾岛航行，造成了敌人的错觉。拂晓，台湾岛消失后则转向，拼命往扬子江口前进。绕过国民党军队盘踞的岛屿，又遭英国驱逐舰阻挠，最后通过水雷封锁区，于6月18日胜利到达上海（访问“民众”轮船长万竞吾同志记录）。

“太湖”轮不幸被劫去台湾

在上海接应的宗之琥正盼望第四艘船的消息时，忽然接到党组织于眉同志的电话，他问第四艘船启航否？宗说尚未接到消息。于眉命其速与香港联系，如果没有驶出就不要启航。

宗之琥立即与香港的卢作孚通话，卢说第四艘“太湖”轮已于昨晚开出。“太湖”轮于1950年6月中旬，由印度尼婆罗洲的圣马林达港载运2000多吨煤抵达香港，卸完货后，香港民生公司

秘密通知周曾貽船长，“太湖”轮要驶沪。同年6月21日上午4时，“太湖”轮泊香港油蔴地，公司襄理王德润和驻港船长林葆格乘机动艇上“太湖”轮，向周曾貽船长交付了五星红旗、海港的联系电码以及到南朝鲜去的假的结关手续。但船上清点人数时，发现三副郑秉钧未回船。原来郑是混进“太湖”轮上的国民党特务。

6月22日凌晨两点，船员们被一阵狂叫声从睡梦中惊醒，数道强烈的光柱直射“太湖”轮，高音喇叭大声吼道：“‘太湖’轮注意，马上停车接受检查！全体船员举起双手到船头集合，如若反抗，马上击沉。”一批如狼似虎的蒋军在船上东翻西找，尔后，令“太湖”轮驶向高雄，国民党海军“太和”舰尾随押送。6月23日，“太湖”轮靠高雄后，国民党海军即调一队海军陆战队驻船。海军部天天来人审讯，搜寻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全体船员、家属，经过了无数次的审讯和威胁恐吓，最后被迫写了悔过书，拍了胸前挂有名牌的囚犯照。8月4日，除船长周曾貽、三副郑秉钧、机匠李宝明、电工李克勤4人外，其余的人被押到汕头海外（周曾貽船长至今生死不明）。

台湾《星岛报》1950年9月21日报导证实“太湖”轮在返沪途中被劫往台湾。

“太湖”轮被劫往台湾，不仅是一只船和船上所载物资的问题，余波还将冲击香港和东南亚船队海员的安全。卢作孚焦急万分，他一面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交通部汇报，一面密电命令香港公司暂停执行向上海发船计划，决定将船驶回广州，船到广州后对外佯称“海员罢工”，船队不再返香港。

“渠江”、“怒江”、“龙江”、“民本”、“民俗”五轮回广州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大军兵临上海城下。汤恩伯部队撤退时，强迫“民本”、“渠江”、“怒江”、“龙江”等四轮运送溃军到定海。情况万分紧急，卢作孚面临这一严峻形势，毫不犹豫，立即命令基隆分公司经理王化行去定海，营救被陷于定海的5艘船和海员（“民俗”轮先去定海）。王化行奉命于1949年5月19日乘“江宁”轮到达定海。定海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最大的一个岛屿——舟山岛上，四面环水，与大陆宁波只有一水之隔，地势十分险要。国民党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残军云集此处，整个岛上战云密布，杀气腾腾，人叫马嘶，乱成一团。王化行到达定海后，立即与五位轮船船长取得了联系，共商对策。“民本”、“民俗”为江船，不能出海，经过船员们70多天无数次的说理斗争，当局同意放行，但只准开台湾，不准开其它港口。“民本”、“民俗”的确是江船，周志全、海里士船长虽然在长江上享有盛名，却无航海经验，船上连海图都没有，特请了两位渔船师傅引航。在“船老大”的帮助下，二轮沿着海岸向南行驶，冒着生命危险由福州闯过台湾海峡，于6月底开到基隆。二轮在台湾进行修理，修好后，经多方交涉才得开往香港。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民本”、“民俗”开回广州。

1949年10月初，王化行奉命第二次去定海交涉“渠江”、“怒江”、“龙江”三轮的放行事宜。这次就更难了，因三轮均系美式登陆艇，可以航海。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不予放行，并扬言要将一再前去交涉的王化行扣留。王无法，只身返回台湾发

电报请示卢作孚，卢立即又拍一个电报给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何世宜，说明这三艘登陆艇很小，不能航海，请求帮助放行。思乡的海员又以船壳、机器腐损为理由拒绝开航。大家同心协力顶住了威胁和利诱，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在漫长的岛屿流亡生活中，船员们饥不能餐，渴不能饮，为了维持极度困难的生活，典卖衣物的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却不悲观、懊伤。他们坚信，一定要回到家乡同亲人团聚，共享解放的幸福。王化行回台湾向联勤总部说明了困难与危险，得到了该部高级顾问、卢作孚的好友陈地球的帮助，1950年10月把“渠江”、“怒江”二轮调回台湾修理。继又佯称无美制部件不能修理，这种材料只有香港才有。经多方奔走交涉，两轮延至11月开回香港（1983年2月访问王化行记录）。

“龙江”轮的海员们与大风搏斗无效，被台风刮到大树岛上搁浅，只得先撤出船员（以后船被救出）。

鉴于“太湖”轮被劫的教训，公司主管船务的襄理王德润找“石门”轮船长王明德和轮机长王崇让研究，几经商量，认为首先要选择“渠江”、“怒江”二轮的停泊地点和搞好保密工作。特决定：1. 为了便于联系，立即把“渠江”、“怒江”轮移动，靠拢“门”字号船。2. 为避免引起注意，叫修船工程队上船进行修理，修好后补足燃料说是准备试航。3. 试航后将船移至香港对面荃湾较为僻静的地方抛锚，不回油蔴地，这样缩短了与大铲边防站的距离又便于早上启航。4. 将船型与船貌特征告诉当地政府和边防部队，如果途中遇到问题，请边防站支持。5. 严守机密（包括对本船的船员），船到大铲边防站以前，任何人不得进入“怒江”轮。由“石门”号船长王明德、轮机长王崇让各选派驾驶、轮机五人，被选的驾驶部有孙鲁、赵宝林、李邦念等；轮机

部有崔荣、杜景生、梁益友等。武器由王明德、王崇让亲自带上。

1950年7月31日，天还未亮，开船人员携带武器和五星红旗登上“怒江”轮，控制了驾驶台和机舱后，立即启航，直奔大铲。快到大铲边防站时，将青天白日旗抛入海中，把五星红旗升了起来，接受边防站检查。全体船员心情万分激动、喜气洋洋地将“怒江”轮驶抵广州（1986年5月访问长航总轮机长王崇让记录）。

民生广州分公司经理周寰轩、华南区海员工会代表龚泽民和广州分公司机关人员赶到南码头，燃放鞭炮热烈欢迎“怒江”轮胜利归来。广州海员工会分别给船长王明德、轮机长王崇让送了“生产先锋”锦旗。海员们个个心情激动，苦和甜织成的幸福使他们高兴若狂。

第二次送“渠江”轮回广州，也是按照“怒江”轮的办法进行的，不过，也颇费周折。船从荃湾驶向大铲途中，一艘香港巡逻炮艇升旗询问“渠江”轮开往何处？“渠江”轮海员不予理睬，全速前进，但巡逻炮艇尾随紧追。“渠江”轮系3600匹马力的美式登陆艇，船小马力大，此时，加满车高速前进。巡逻炮艇紧追不舍，眼看要被追上，彼此都能看见驾驶台上的人了。在这紧要关头，“渠江”轮海员一面加快速度，一面升旗（因已接近大铲边防站），巡逻艇见“渠江”轮桅杆上已经飘扬起五星红旗，不敢再追，便调头驶去。华南区工会和民生公司前来欢迎的同志，知道此事后，欢迎倍加热烈。母亲见到脱险归来的儿子，妻子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高兴得抱头痛哭，泪水涟涟。华南区海员工会特又向石门轮船长王明德、轮机长王崇让赠送了题为“劳苦功高”的锦旗。

七艘门字号轮回广州

民生公司在加拿大造的九艘门字号轮船，其中“荆门”、“夔门”已于1948年5月回重庆，尚有七艘未回。又因“太湖”轮被劫，震动极大，余波未息，所以卢作孚紧急会同交通部有关部门，果断地执行了新的方案。七艘门字号轮经过一番努力，准备工作就绪。

行动的那天，“石门”、“剑门”两轮在省港线上，“虎门”、“祁门”在港澳线上，“龙门”在省一港一澳三角线上。为了不被察觉，“石门”轮照常码头上卸货、装货，按时于晚上10时满载旅客由广州开香港，尔后见机回到广州。“剑门”轮同样在晚上由香港回广州。“雁门”、“玉门”是不定期航行广州的船，二轮满载旅客和货物由香港到澳门后，也先后由澳门空船回广州。

七艘门字号轮在卢作孚的指挥下，通过全体船员的努力，全部回到广州。

“绥远”、“定远”二轮回广州

“绥远”轮由新加坡结关去三打根，准备中途折回海南岛。当航行到越南海岸时，被不明国籍的军舰追逐不已，在逃难中搁浅，海员们奋力抢救脱险，又被法国军舰扣留去岷港，海员们斗争时间长达7个月零两天。长夜漫漫，情意凄凄，在几个月艰难的航海中，颇有“云海茫茫无归处”之感。船上核心组藏有一些好书如《方志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苏拉》等

等，海员们在苦难环境中相互传阅，相互共勉。端午节、中秋节举行晚会，有的吟诗作赋，抒发游子思乡情怀。船长周必祥唱起了《苏武牧羊》曲，唤起了船员们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周必祥后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秋，月色清冷、宁静，辽阔的海洋之夜，本来就潜伏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思，这一声牧羊曲就像大海的浪涛冲开了海员感情的心扉，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水盈盈，一个个更加想念自己的亲人，更加渴望早日回归故乡。

1950年4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同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迺仁谈话时，对民生海员的爱国行动大加赞许，并指出：停在香港的船是不怕敌人轰炸的（民档永久8号）。卢作孚指挥若定，同广大的海员一道，同舟共济，不怕牺牲，冲破重重阻挠，从1949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经一年多的努力，把解放前夕被道留在香港的轮船、航行海上的轮船以及从台湾脱险开到香港的轮船一共18艘（“绥远”和“定远”两轮是租给丹麦的，1951年中丹解除租约后，直接驶回广州。“黄海”轮同年也安抵广州。）全部开回广州，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运输力量。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好的成效，颇为各界所称道，卢作孚本人也深感自慰。

卢作孚对价值近2000万美元（按今日的实际币值计算，超过5000万美元）的保产大事，的确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1983年《武汉文史资料》总第十七辑）。

党和人民政府对卢作孚极为关心，为他回到北京作了精心的安排。民生公司人事室主任何迺仁青年时代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有旧交。1949年12月，何迺仁回到北京，作为民生公司驻京代表，负责民生公司同周总理的联系工作。1950年春，为具体安排卢作孚回京和传达党对民生公司的政策，何迺仁根据周

总理指示，两次专程前往香港。何第二次到港同张铁生研究了卢作孚回京的具体方案：“按中央的考虑，卢作孚回京的时间应安排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前夕”（《武汉文史资料》总第十一辑134页）。为保障民生公司船舶、资财及卢本人的安全，中央决定必须保密，不登报、不广播。

1950年6月15日，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开幕，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随后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按第一次会议预留的名额，卢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京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卢作孚。毛主席举行了两次便宴，一次为工商界人士，一次为西南地区民主人士。周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就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交通运输等问题多次与卢晤谈。（《武汉文史资料》总第十七辑）。

10月初，卢作孚离开北京，乘火车到武汉，然后从武汉乘民生公司的“夔门”轮回重庆。卢的心情特别兴奋。他对船员们说：“我们公司的‘荆门’、‘夔门’是长江上的金牌。这个金牌我看不全靠船上的先进设备，而是靠航行中的安全、准点，靠对旅客良好的服务态度。我们可要保住这个金牌啊！”说完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1986年8月访问“夔门”轮大副熊燕柱记录）。20几年的艰苦奋斗，惨淡经营，航权到手后，从一条船发展到148艘，从千里嘉陵江到万里长江、沿海和远洋；从川江“异军突起”到全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回首往事，卢作孚怎不感慨万端呢！

“夔门”轮抵达重庆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特派曹获秋市长上朝天门码头迎接卢作孚。随后，邓小平又接见了卢作孚。他精神振奋，积极调集江海轮船，竭尽全力地筹划着新中国的航运建设。

潘昌猷经营重庆商业银行内幕

石体元 刘选琛 赵世厚

重庆商业银行（简称重庆银行）自1931年其前身“重庆市民银行”成立开业算起，至1950年停业结束，先后经历了20年，在重庆金融界中颇有影响，与聚兴诚、美丰、川盐、川康、和成等行，被称为当时重庆地区六大地方银行之一。它的营业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活动的内幕。谨据现存资料和我们记忆所及，将该行始末概述如下：

一、重庆商业银行的前身——重庆市民银行创办经过

由筹备到正式开业

重庆在抗日战争以前，一直是川军刘湘防区的中心，也是货物集散的重要港口。根据这一情况，刘湘于1926年设立了商务督办公署，最初派的是第一师师长唐式遵兼任督办。1927年唐调任渝简马路总局局长，刘湘改派教导师师长潘文华继任督办。1928年重庆正式设市，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府，仍由潘文华兼任市长，并决定开辟新市区，修建市中区公路，所需经费由市府自筹。于是，